

韩国钧应考屡受挫

□夏俊山

高考在即,有人深信知识改变命运,谈起历年的“高考状元”,如数家珍。那我们不妨探究一下曾两任江苏省省长的韩国钧的应考经历,不无裨益。

韩国钧,字紫石,1857年出生于泰州泰县海安镇。清光绪五年(1879年),他参加乡试合格,中了举人。但他的路不是一马平川。

韩国钧的青少年时代,沿袭了几个朝代的科举制已臻十分成熟。作为选拔官吏和人才的一种考试制度,清代的读书人必须先参加“童试”,应试者无论年龄大小,皆称“童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又名“廪生”,俗称“秀才”。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可参加正式科举。

正式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在省城三年举行一次,称“大比”,考中者称“举人”。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于礼部举行,考中者称“贡士”。殿试则由皇帝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合格的统称“进士”。从童生到状元,台阶一级又一级。

唐代舒元與《上论贡士书》记载:“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泊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席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由此看来,科举考试的考场内还是相当严格规范的。贡院(考场)四周围墙高筑,派兵驻守,把门胥吏点名呼叫。天冷席单,“飞雪寒料峭,冻杀

少年郎”,这是应考必须付出的代价。

至于考试时间,李欣在《古今诗话·举人试烧烛三条》中说:“举人试,日既暮,许烧烛三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发题后,答题到日暮,还可以点烛继续,直到燃尽三支蜡烛。这样的考试,要连考三场,一场考三天,直考得“囊衣博带满尘埃”。

韩国钧初次参加科举考试是在18岁那年,这跟我们今天的高考年龄几乎一致。他在《永忆录》中写道:“余十八应童子试,诗赋场列名第八,而以八股文见黜。题为‘圣人之忧之,使契’,余竟不知如何着笔。后读之文者,始慨然悟。”从这段文字可知,科举考试不像今天有数、理、化、生、外等科目,但也要考好几个种类。其中,韩国钧考得好的是写诗作赋,考得最糟糕的是写八股文,他连题目也没看懂,怎么写?估计他是交了白卷。科举考试,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韩国钧18岁参加科考,八股文出的题目源自《孟子·滕文公上》:“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考生作文,不宜自己发挥,表达个人的观点,而是“代圣人立言”,对亚圣孟子的思想加以阐发,韩国钧不擅此道,落榜了。直到看了考中者的文章,方才醒悟,知道该怎么写。就像今天有人编了《高考满分作文选》,考生读者众多。笔者收藏了一本清代手抄的科举复习资料,抄的都是成功者应试的八股文,其中有两篇是康熙年间海安人陆舜

进士时所写,不知道韩国钧读了什么辅导资料。

三年后,21岁的韩国钧再次应童子试:“以诗赋列第一名。赋题‘君子淡以成’,文题‘殷周继以义’……忆复试,诗题:‘雪中芭蕉’,余有句云:‘染成怀素纸,冷煞灞桥人。’缴卷时,亲见学使加圈其上。”(《永忆录》2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幸运的是,韩国钧这次通过了,成了秀才。

1879年,韩国钧考中了举人,接下来再考,却一再受挫。据他自己在《永忆录》记载:“余应童子试,二届得售,乡试一届即黜,独春明报罢四次,他无所苦,只听红录时,如热灶之蚁,行坐皆无一可,及既报罢,千里长途即在目前,尤为怅惘。”也就是说,韩国钧乡试考中举人后,又考过四次,均告失败!

韩国钧为何要反复应考?原来,按清代的制度,中举后未必就能获得官职,还要继续考“贡士”。可是,韩国钧屡考屡败,该怎么办呢?当时还有一条出路:应大挑。

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应大挑”类似于今天的面试。台湾著名学者沈云龙在《清代之大挑》中说:“清代举人选官之制,有考选,有拣选。拣选初兼考试,后以其具文而罢之。乾隆十七年,定恩科拣选,以知县教职并用。其数,大省四十人,中小省以十人为差,是为大挑之始。后渐推渐

广,就人数匀挑,以扣近三科为率。于是凡应会试三科不中之举人,得赴大挑,由钦派王大臣共同拣选,并不试以文艺,只就其人年貌,分别去取,亦人仕之一途也。”这段话告诉我们:清代举人会试失败三次以上,可以参加“拣选”(应大挑)。“拣选”主要看外表。

韩国钧“应大挑”的情况,他在《永忆录》云:“余于己丑(光绪十五年)应大挑试。大挑于每排二十人中,挑三人为宜。己卯(光绪五年)于当时为近科。余居末排,仅十七人。初挑三人,余与同年邹士敬、徐采先也。既而王大臣谓此排只应二人,今多一人,即命采先去,留余与士敬。采先既黜,遂以潦倒终其身,不复再振。”

大挑以20人为1排,20人中选3人,韩国钧被选中了。可是,他这1排只有17人,必须再淘汰1人。结果淘汰了徐采先,此人后来潦倒一生。而韩国钧在这次“大挑”中列“一等”,可任知县;如果是二等,则任教职。

韩国钧是幸运的,他22岁中举后,先后4次应考,均未如愿,只能在如皋、甘泉、六合、金陵、昭文等地任教读十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终于获得做官的机会,步入仕途。他曾任河南镇平、祥符等县知事、铸钱局总办、河北矿务局总办、江苏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省省长等职,其起点就是“应大挑”。

张謇书《薛母郭恭人墓志铭》

□薛来彩

杨永言,其婿也。恭人生女子于五,前三人皆殇。五适袁君,六适山西知县熊方堃。以兄公教授君次子为后,即葆楫也。光绪壬午科江南举人,官光禄寺署正。恭人生于嘉庆己卯五月十九日,卒于光绪壬辰闰六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四。次年三月归葬于罗梁山之先茔。

慈翁窃惟妇人以持静为德,其不幸以节烈见者,非始愿也。然古之志烈女兼取才艺,亦必有奇特殊异之观。其为传列女者所不及,而能相夫迪子,克成忠孝,兴立门户,在前史所称如唐李景让之母郑、杨凭之叔母薛、宋苏易简之母薛、贾黄中之母王、欧阳文忠之母郑,皆以妇德母仪治范百代。虽无魂行伟闻,而有裨于国,有造于厥家,校之摩笄截臂,为功于名教一焉。呜呼!恭人章妾滂母殆兼之,而不有其名者矣。系之铭曰:是相所天,为真淑官。衿袪自全,室家以完。有子于先,有女侧贤。胡不百年?下从九原。贞柏芳兰,长丰其阡!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大学士山西道监察御史稽查兵部翰林院事务会稽李慈铭撰文

赐进士及第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通州张謇书并篆盖

薛母郭恭人是清咸丰进士、监察御史薛春黎的继配夫人,也是杭州知府、惜阴书院院长(院长)薛时雨的二嫂。她于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八去世,享年74岁。她的嗣子,光禄寺署正薛葆楫根据她的遗愿,请浙江进士李慈铭撰写墓志铭。薛葆楫接到李慈铭写好的墓志铭后,便修书给光绪二十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张謇,恳请他为墓志铭书丹。张謇欣然答应。

薛葆楫为什么请张謇为嗣母郭氏墓志铭书丹?张謇又为什么极爽快地答应?

这要从张謇与薛葆楫的深厚友谊说起。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謇考入南京惜阴书院,成为薛时雨门下弟子。薛时雨不仅在学业上对他悉心指导,而且在生活上对他也是体贴照顾。知道张謇家贫,薛时雨不仅免收他的学费,而且还免费安排他和自己的侄子薛葆楫、嗣子薛葆楫一起食宿,在惜阴书院住读三年。张謇第一次见薛葆楫、薛葆楫时,就对他俩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在同治十三年五月初八日的日记中写道:“诣薛山长,极承激赏,并见世兄怡澍、葆楫,翩翩美少年也。”“怡澍”应指的是薛葆楫,而薛葆楫字怡澍,这当是张謇的笔误,因为是初次见面,还没搞清楚他兄弟俩的字号。此后,他与薛葆楫和薛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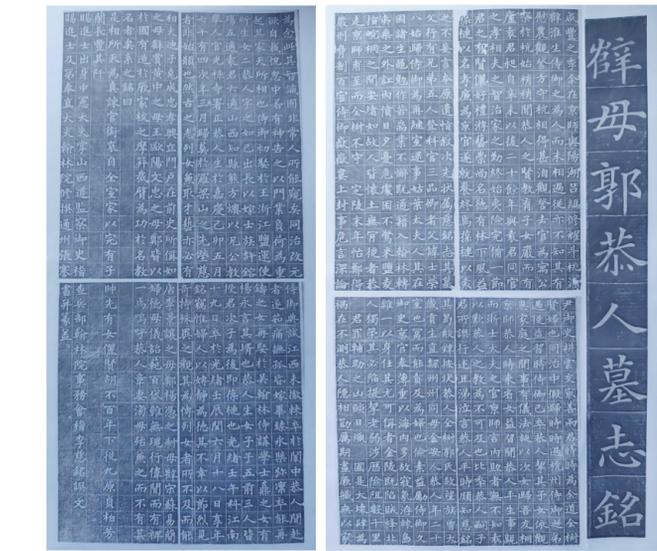
楫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薛时雨处,张謇感到格外舒畅,随后的日记中也多有记录,多次写下他与薛葆楫在清凉山下散步纳凉的情景,并且“怡澍(薛葆楫)以《文待诏帖》《藤香馆诗抄》见惠”。此后他们成了朝夕相伴的同学加朋友。张謇对薛葆楫赠送的书籍爱不释手,在日记中写道:“看《藤香馆诗抄》,又竟烧二寸。”因这层关系,薛葆楫请求张謇书丹,张謇当然不会拒绝。

从李慈铭撰写的墓志铭,可以看出郭氏确是一个贤惠坚毅、有远见卓识的女人,能处困不惊。她从小跟随父亲识字读书,博通经史,有“不栉进士”之誉。薛春黎在江西主持乡试时猝逝,郭氏便毅然决然地带着女儿们从北京辗转千里,一路奔波,到江西为丈夫奔丧,并按照薛春黎的遗愿,过继侄子薛葆楫为嗣子。在兵荒马乱之际,她不仅护一家人周全,而且悉心培养嗣子薛葆楫,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李慈铭在文中多有赞颂。

这里有一则关于郭氏选婿的事,值得一叙。郭氏料理完丈夫的丧事后,挈其子女跟随小叔子薛时雨到杭州生活,家中尚有一女薛仪祥未嫁。据说,郭氏托薛时雨为一女择婿,薛时雨故意严肃地问她:“二嫂择婿可有什么标准?是选有德的、有才的、还是有貌的女婿?”郭氏答当然选有德有才的女婿。于是,薛时雨哈哈大笑说:“我这里正有这么个人,德才兼备,不知可否?”说着,从袖中拿出袁祖所写文章递给二嫂,郭氏看了很高兴,遂同意。关于郭氏择婿的事,《清稗类钞》中有记载。

张謇在书写这份墓志铭时也是满怀深情的,采用他最擅长的楷书书写,笔致方正稳健、秀逸峻拔,结体雄厚厚朴、柔中带刚、含蓄高雅,堪称精品。由此可以看出张謇不仅是一位状元实业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曾称赞他书法“字亦雅,非常手也”。晚清著名大师俞樾曾写过一副对联称赞他的书法曰:“陈太丘如其道广,颜鲁公何止以书名”。

张謇书丹的《薛母郭恭人墓志铭》由苏州人唐仁斋刻石勒碑。唐仁斋是清代苏州著名的工匠,年仅33岁,留下的石刻作品极少,所以这块墓志铭难得。这块石刻被运往安徽省全椒县复兴乡,埋于罗梁赵村郭氏与薛春黎的合葬墓。后墓被毁,墓志铭不知所终,幸留下了拓片。



偶得一份张謇书丹、李慈铭撰文的《薛母郭恭人墓志铭》拓片(见图),颇有捡漏之喜。细究深考,也有意外之获。拓片为九块,全文录于下:

咸丰之季,余在京师与湖湘吕编修耀斗、桃源尹御史耕云交最善。两君时时为余道:全椒薛淮生侍御之为人,而未相过从,亦不知其有贤妇也。同治中假归时,时过杭州。侍御之弟慰农观察方守杭,相得甚。洵观察去官为寓公,过从益习。时侍御已卒,恭人挈其子女依观察于杭,始稍稍闻恭人之贤,教育子女严而有恩,家庭之间事有依法。旋以次女归吾友桐庐袁君。自辛未以后二十余年,与袁君同官京师。恭人时来省女,益习闻恭人平生事亲之孝,相夫之智,治家之勤,始终夷险,完备一节。而浙士大夫之官京师言内助者,无不知袁君之有贤内,好礼游艺,崇尚名德,有林下风,盖以叹恭人之教为不可及也。比年,恭人嗣子葆楫以孝廉为京官,遂就养终焉。葆楫以袁君所撰行述,且涕泣言恭人平时颇知慈翁之妄言,本原道信,叙次先状,属慈翁志其墓,其曷敢辞?

按状,恭人全椒郭氏,故望族。曾大父

行,有兄弟五人登科官三品卿者。父讳士荣,岁贡生,直隶州州同。母金安人。恭人年二十八始归侍御,为再继室。侍御娶叶太夫人,其在室也,富而能贫。及为妇也,俭素益励。侍御久困诸生,龟勉作苦,端业不懈。既通籍,入翰林,转御史,京官奉渥,重以海内多故,寇氛浩淼,岛夷乘之,外江内债,日夕忧危。处困不惊,米盐复杂,一以身心。其尤可称者,金陵既陷,贼降北指,皖桐之间,安堵如故。人皆怀土,无肯徙者。恭人独策其必陷,提挈老弱,涉历险阻数千里,走京师。甫至,而全椒不守。定陵末年,怡、邦得君罪辅助之,凶焰日炽,因是未撤棘,卒于闾中。恭人闻赴,欲自裁,恍惚中若有神告之以门业负荷为重者,遂茹痛托孤。昏嫁毕珠,冰炭弥漂。卒能再起其家,天所相也。

侍御初娶于王,浙江盐运使铸之女,再娶于吴翰林侍讲学士薰之女。有所生女二,恭人字之如己出。长以嫁士族,许穆、

南通首批工业空气净化设备研制史

□吴元进

20世纪8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工程师被调入南通市郊区政府工业办公室(区设计委前身)。鉴于当时工业空气净化设备已成为现代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设备之一,办公室袁国华书记和王具权主任安排我对当前工业空调市场作一次社会调研。

根据当时南通郊区乡镇工业的实际情况,我与南通市棉织八厂生技科科长顾桂根及南通市玻璃钢厂书记三人前往靖江县工业空调设备厂进行参观、调研,并由我主笔写下调查报告,并就企业发展状况、工业空气净化设备在现代工业生产中的作用和发展前景、对郊区组织研制试产的建议,分别向区工业办公室、区委、区政府作了专题汇报,得到认可,特别是时任区委书记的李建勋高度重视。经领导研究决定,在全

区组织工业空气净化设备的生产会战工作。

1984年2月我被选任南通市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并担任南通郊区空调会战领导小组组长,钟秀乡党委书记马汉荣和乡长范新泉担任副组长。会战贯彻“区乡联办、以乡为主、全区支援”的方针,选择条件较好的玻璃钢厂和机械厂为实体企业,于1985年2月在钟秀东路26号成立“南通昆仑空调工业公司”,由南通市玻璃钢厂厂长沈柏青、钟秀机械厂厂长顾桂根和钟秀乡工业公司经理蒋元骨担任负责人,在全区抽调部分技术骨干,聘用天津大学讲师严俊(曾任总经理)、国棉一厂工程师李翰章、南通合成纤维厂工程师汪炎炎组成精干的技术专家团队。

是时南通刚筹建合纤厂,从国外引进

了全套先进的工业空气净化设备机组。为此我们抓紧时间去南通合纤厂进行测绘设计,经过近一个月的日夜奋战,我们将有关设备测绘完毕,并对其进行了国产化改进,取得初步成效。

初机组的电子自控仪表部分,我们聘请四川绵阳十一电子研究所的有关技术人员进行设计,先后对两种型号的空调机进行了部级鉴定,顺利通过,并获得国家生产许可证,标志着我们工作的圆满成功。

南通昆仑空调工业公司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研制生产大型中央空气处理机组、空气净化设备和承接空调净化工程的国家中型企业,为国家重点工程、国内外有关核电工程和发电厂的建设,提供了高品质的产品。如为中国科学院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中国空间研究院921工程、北

京人民大会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南京禄口机场、广州地铁工程、泰山二期二期核电站、田湾核电站、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C1、C2项目等进行的空调配套工作,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和专家们的好评。

南通昆仑空调工业公司的产品多次荣获“南通市优质产品”称号以及“江苏省新产品开发应用金牛奖”“全国暖通空调名优产品特别奖”“公司多次被评为南通市文明单位、优秀企业和江苏省先进集体,并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的嘉奖令。

南通昆仑空调工业公司2002年改制为民营股份制企业,沈柏青为董事长(法人代表)。多年来公司一直是乡、区、市重点纳税大户之一,为南通市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传家宝



第一号光荣证

□庄炎

我家有一份珍藏了78年多、原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发给抗日烈士庄凤林同志家属的第一号光荣证。它是对庄凤林抗日救国、英勇牺牲历史的表彰和见证。《梁灵光回忆录》曾讲到1941年12月,县警卫团在地下工作人员配合下,攻打金沙镇敌据点取得辉煌战果。这位地下工作人员就是庄凤林。

庄凤林是我的胞兄。我家原先住在南通县金沙镇东五里庙乡下,父母生育两男一女,即胞兄庄凤林、胞姐庄凤芝和我。

1938年3月17日,日本侵略军从姚港登陆。庄凤林和金沙地区许多爱国青年一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金沙沦陷后,日寇经常下乡骚扰,有时受到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庄凤林也曾给予配合和支持。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第三纵队按苏北指挥部的决定,在司令陶勇、政委刘先胜率领下东进,到达掘港镇。庄凤林闻讯和几个爱国青年赶到掘港,要求参加新四军。接待的同志劝说他们等新四军进驻南通县。庄凤林回来即向父母要求在金沙镇租住房,开了小香店;父亲常去照料,不久凤芝姐和我也去和胞兄同住。虽开了店,庄凤林并不安心做生意。1940年12月初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1年1月中共南通县委重建,庄凤林和县委联络部联系上,担任了驻金沙镇据点情报员。

1941年冬,庄凤林策应南通县警卫团攻打金沙镇取得胜利后,被吸收加入了共产党。因叛徒出卖,1942年2月9日下午,庄凤林不幸被捕。敌人对他施加种种酷刑,一再威逼他招供,他始终坚贞不屈,遭杀害时年仅19岁。

敌人杀害庄凤林之后随即到我家抄家。家门被封,一家人哭哭啼啼去流浪。新四军曾临时接管,后来还把我和姐姐送到海边由梁灵光任董事长的三余中学读书,一切费用全由新四军提供。父亲也给一些商店临时打工,勉强维持生活。

1946年的春节前夕,县里领导来我家慰问,把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三十五年一月颁发的第一号光荣证送给我父亲。1949年1月28日金沙解放。县人民政府又于1951年给我家颁发了新的烈属证,以后还补发了抚恤金。父亲、姐姐和我都被居民推选参加了工作,姐姐和我还相继被吸收加入共产党,当上国家干部。

通吕水脊末端小镇

□沙屿人

历史上的通吕水脊,形似百里巨龙,劈波斩浪,由南通唐闸、天生港一带,向东南延伸至黄海之边,末端称“廖(料)角嘴”,因建有龙皇庙,故又俗称“庙角嘴”。

廖角嘴在廖角,即吕四镇东的古秦潭,秦潭又名“秦团”,其名由明清防倭入侵的“巡团”驻军谐音而来,在当地方言中,“潭”与“团”音同字异。即先有廖角、廖角嘴,后有秦潭之名。“廖角观潮”是吕四的十大名景之一。后廖角嘴和龙皇庙坍入大海,只留下旧时廖角分潮的传说,海神庙旧址及张謇所建挡浪墙的部分遗迹。

廖角嘴特殊的地理位置产生了特殊的功能,把东侧之水一分为二,也即廖角分潮:左为滔滔黄海水,右为滚滚长江水,海水重、江水轻,因而水位左低右高,又因“廖角涨潮马跑”,形成蔚为壮观的“倒天潮”,潮水看似向西,实际回头向东。又有千姿百态的“海浪滔日出”,这是更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大江南北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地前来一饱眼福,明代李梦周等留下“奇流分海角”“一源争人倒天潮”“天际红轮看晓日”等佳句。

海神庙又称“天后宫”,在秦潭西头甲岸堤上,为1768年乾隆皇帝所敕建,并题书“灵彰海晏”四字。

1901年张謇重修海神庙,一为顺民俗,二也可作为兴建通海垦牧公司的办公地点和住宿处。因为它处于吕四至海复的中点,张謇对此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并曾题书“与天无极,大海不破”,又作《吕四海神庙》诗一首:海神庙前新月明,秦团窗外海潮生。当年约与听潮者,尘土墙头有姓名。20世纪40年代,海神庙被日寇拆了建碉堡,现今庙址仍可见。

挡浪墙是张謇1905年为保护吕四东部田地和所垦八个堤而建,有土墙、板堤墙、水泥墩墙三种结构,由于该墙处于风口浪尖正面,年年受损年年修,1941年记录总长为1479米。它是全国“三大名挡”之一(另二挡是新疆挡风墙及古城挡墙)。本人五年前实地丈量时,挡浪墙只剩下了约455米。

挡浪墙在防坍保地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群众说:挡浪墙胜爹娘,保护陆地有棉粮。现今挡浪墙处已修建为张謇垦牧公园。

一九四九年前秦潭小镇徒有虚名,乃是草荡一片。有民谣“野鸡天上飞,兔子荡里钻,草屋拾来闻,常常去讨饭。”如今靠渔业致富,旧貌换新颜,成为吕四港镇继天汾后第二个现代农村集镇。

海岸线东移,秦潭周边成为新兴工业区,有大唐电厂、华锋纤维等央企,并与吕四渔港、通州湾连为线,还有多个火车停靠站,公路、铁路、海运四通八达……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为佳。(投稿邮箱:csjy100@163.com)